

官员辞职回家照顾病妻16年

他25岁,就当了乡党委副书记;新婚不到一年,她却病倒了——她担心一帆风顺的丈夫会离她而去。没想到,丈夫却辞官回家,并伺候她已经16年。

觉得自己耽误了丈夫前程,她一直叫他“书记”。她说,这是自己对他唯一的报答。



看着丈夫满头白发,张兴平很心疼

为爱情流热泪

3日中午,重庆大足县城青年路24号1单元2楼。张兴平坐在轮椅上盯着电视又哭了,脚下是沾满泪水的纸巾——电视剧里的女主人那么优秀,可丈夫还是抛弃了她。

“打牙祭吃鱼喽。”门开了,丈夫陈昌良提着活蹦乱跳的鱼儿进门。每逢周末,陈昌良都要去河里钓鱼回来给张兴平熬汤喝,他说这样的鱼有营养。

张兴平急忙擦干泪水,“又哭了?”张兴平极力掩饰还是未逃过陈昌良的眼睛——16年了,妻子心情好不好,什么时候哭,什么时候笑,他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他知道,妻子得了重病缺乏安全感,特别是看了情感电视剧,常常把剧中的情节联系到自己身上。“放心,我不会离开你的。”他经常这样说。

“你怎么就那么好呢?”张兴平泪水又流了出来。她说,今天的泪水不是因为伤心,与剧中女主人公相比,自己的命太好了,遇到了这个好丈夫。

他会离开我吗

陈昌良与张兴平同为大足县原明星乡招聘干部,1987年元月,二人结婚,并有了儿子。

结婚不到一年,张兴平手指关节出现疼痛症状,接着发肿,后来脚也肿痛,既坐不下去,又站不起来……医生诊断,她患了类风湿疾病。

“这辈子完了。”儿子刚出生就给了妹妹、妈妈喂养,工作也没了,吃饭穿衣上厕所都得丈夫照顾,自己只能一天与轮椅相伴。

张兴平经受着病痛的折磨,丈夫的仕途却越走越平坦——1989年,25岁的陈昌良调任原城南乡党委副书记。丈夫当官了,张兴平却高兴不起来。

“担心他把我甩了。”张兴平每

天呆在家里看电视,节目里那些曾经生死相爱的人分手了、背叛了,她越看越不是滋味;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,隔三岔五就会传来同学离婚、朋友分手的消息……

“那些身体健康、才能出众的女人婚姻也会破裂,何况我一个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病人?”张兴平总担心丈夫嘴里会蹦出“我们离婚吧”几个字。

然而,陈昌良什么都没说,只是默默地为妻子做着一切:每天早晨6点起床,伺候完她洗漱、吃饭后匆匆赶去上班;中午,还要抽空回家做饭……

辞官伺候病妻

其实,张兴平的担忧,陈昌良有所察觉。

每两天的药量,张兴平却要偷偷3天吃完。陈昌良知道,妻子是担心自己每月300元的工资不够开支;张兴平喜欢看电视剧,特别是情感片,每看必哭,陈昌良明白,妻子常常将自己置身剧集中……

“心灵的煎熬比病痛的折磨更痛苦。”陈昌良一直安慰着妻子,也在深深思考,如何才能让她安心养病?

1992年夏天一天,天降暴雨,一人山村出现滑坡险情。来不及告诉妻子,陈昌良带着干部直奔事发地点。

在雨中忙活一天,陈昌良晚上回到家中发现,妻子不见了。

陈昌良跑出门外,夜幕中妻子侧倒在地上,旁边水桶里的水洒落一地——她饿得实在不行了,扶着墙壁出去提水煮饭,结果摔了一跤。扶起妻子,陈昌良落泪了。

“辞去副书记职务。”1993年,陈昌良向区委领导提出辞职申请。时任区委组织委员的周仁厚说,陈昌良当时才29岁,前途光明,辞职可惜了。

从一个农村娃当上乡干部,陈

昌良也想出人头地,也舍不得辞去这个职务。这个决定,他前后思考了两个月。

他是我的“书记”

“他是有理想的人。”丈夫辞官伺候自己,张兴平依然高兴不起来。她说,陈昌良幼年丧父,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,高中毕业后考上招干干部。那时,陈昌良高中课本未曾放下,还想圆自己的大学梦。

“他是我的‘书记’。”张兴平觉得拉了丈夫后腿,让他的理想成了泡影。她说,丈夫是因为自己辞职不当书记的,也许他早已习惯没有人叫书记的日子。但回到家里,自己一定要叫他“书记”,算是对他的“补偿”。

“他一个人顶四个人。”现在,45岁的陈昌良满头白发,张兴平心疼地说,这都是苦熬出来的:在家里,陈昌良既是一名丈夫,又是孩子的母亲和父亲,还是她的保姆;在外,他又是大足县宝顶司法所一名司法干警。每天清晨6点,陈昌良就要起床打理家务,伺候妻子;忙完一天的工作,晚上回家还要做饭、洗衣服,不足2000元的月工资,既要供上大学的儿子,还要为妻子买药。

“患难见真情!”宝顶司法所长贺本秀说,陈昌良这种忠于爱情、不离不弃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,平时也未曾因照顾家人耽误工作。

记者问陈昌良:照顾病人可以请保姆解决,为什么不那么做?

陈昌良说:保姆只能照顾妻子的生活,病人的心理慰藉离不开亲人。我是丈夫,我要负责。

记者又问:那工作不是丢了?

陈昌良说:工作离开了我,会有更多、更优秀的同志去做;妻子离开我,情况也许就很糟糕。何况,因为家人影响工作,更对不起组织和群众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袁苏妹:只会写自己名字的荣誉院士

袁苏妹从没想过,在自己漫长的生命中,也有可能站在舞台中心。2009年9月22日,当香港大学向她颁发荣誉院士那一刻,这个82岁的老太太,“看起来神气极了”。

她被安排压轴出场。这一天与她同台领奖的,有汇丰银行曾经的行政总裁柯清辉、香港富豪李兆基的长子李家杰,以及曾获铜紫荆星章的资深大律师郭庆伟。与这些政商名流相比,这位老人的履历显得异常单薄:学历,没读过小学,除了自己的姓名,她当时还不会写其他字;工作经历,从29岁到73岁,在香港大学的大学堂宿舍先后担任助理厨师和宿舍服务员等职。

这场历年完全以英语进行的典礼,此刻因她破天荒地使用了中文。香港大学学生事务长周伟立先用英语宣读了写给这位老人的赞辞,接着又以广东话再次致辞。直到此时,从未受过教育的袁苏妹才听懂,颁发院士的荣誉,是为了表彰她“对高等教育界作出独特的贡献,以自己的生命影响大学堂仔的生命”。

“三嫂就像妈妈一样”

如果不是那一身黑绒红边的院士袍,她看上去实在是个再普通不过的老太太。她走路很慢,弓着背,一副典型的老态龙钟的模样。然而在港大人眼里,这个矮小的女人形象“高大”得近乎“一个传奇”。

有人开始称她为“我们的院士”,但她显然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——“三嫂”。因为丈夫在兄弟中排行第三,三嫂这个称谓被港大人称呼了半个多世纪。

“三嫂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。”很多宿舍旧生都会满怀深情地说出这句话。当然,就像描述自己母亲时总会出现的那种情况,这些年过半百、两鬓斑白的旧生,能回忆起的无非都是些琐碎的小事。

今年70岁的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副行政主席梁乃鹏还记得当年考试前“半夜刨书”,三嫂会给他煲一罐莲子鸡汤补脑。已经毕业15

年的律师陈向荣则想起,期末考试前夕高烧不退,三嫂用几个小时煎了一碗凉茶给他,“茶到病除”。

时常有学生专门跑到饭堂找她聊天。男孩子总会向她倾诉自己的苦闷,诸如不知道如何讨女友欢心之类。女孩子也会找到三嫂,抱怨男孩子“只顾读书,对她不够好”。多数时候,三嫂只是耐心地听完故事,说一些再朴素不过的道理,“珍惜眼前人”,或是请他们喝瓶可乐,“将不开心的事忘掉”等等。每年毕业时分,都会有很多穿着学士袍的学生特意跑来与她合影留念。

就连大学堂球队的比赛结果,三嫂也常常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。“输赢都好。”她乐呵呵地说。迎接球队的总是她最拿手的菜远牛河或马豆糕。

那些大学时独特的味道,成为旧生每年聚会时永恒的话题。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像个孩子

一样夸耀三嫂的手艺:“你知道吗,大西米红豆沙里面的西米直径足有1厘米,好大一颗!”

很少有人知道,为了将这些“大西米”煮软,三嫂要在灶台前站上两个多小时。为了让红豆沙达到完美,她只在其中放新鲜的椰汁。而蒸马豆糕时,为了让它“有嚼劲”,她必须用慢火煲1小时,不停地用汤勺搅拌”。

背影让学生“不敢忘记”

然而自从上世纪70年代安装心脏起搏器以来,三嫂再也无法继续在厨房工作了,这位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从此转做清洁工。男生们历来喜欢在饭堂开派对,每每狂欢到凌晨两三点,尽管这早就过了三嫂的下班时间,但她总是等到派对结束,再独自进去清理地板上的啤酒、零食和污渍。

那个在凌晨的饭堂里独自拖地的驼背老人背影,让许多学生总“不敢忘记”。

直到今天,小女儿卫锦璧还记得妈妈“见学生比见家人的时间还多”。尽管竭尽全力工作,三嫂一家当时的生活仍然十分拮据。她因舍不得花钱坐巴士,有时竟会提着40只鸡从街市一路走回山上的大学堂。

虽然父母都在食堂工作,但卫锦璧兄妹自小很少沾光。有时,三嫂会带回家一包切三明治剩下的面包皮,全家人的晚饭就是用热糖水泡面包皮。偶尔,猪油拌白米饭也能当一顿晚餐。

不过,这些记忆却在老人头脑里慢慢开始模糊。眼下,她最害怕自己患上老年痴呆症,担心不能像现在一样,“记得每一个宿舍旧生的名字”。直到今天,每次受邀参加

旧生聚会,就算有人已经移民十几年刚刚回港,她也能一下叫出那人的名字。

“这个是大律师,这个是做生意的,这个是眼科医生。”翻开相册,她就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介绍这些学生。她甚至记得一名只在大学堂住过3个月的北京教授,对方曾邀请她一起“打太极拳”,她“怪不好意思地”拒绝了。

今年已经67岁的香港赛马会主席陈祖泽,在三嫂的眼里“好文静”,仍然是个“乖仔”。被授太平绅士的梁智鸿,大学时总是“穿着整齐才进食堂吃饭,从来不会穿拖鞋”,只不过“大学时头型就是中分,不知道为什么到今天都没变过”。

有男生甚至称,三嫂至今还记得他们大学时历任女友的名字。

总是开名车接送三嫂参加旧生聚会的陈向荣说:“能够做她的司机是我一生的荣幸。”

三嫂的提名“全票通过”

如今她早已经退休了,但她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大大学堂。每年,她会回来制作“宿舍之血”。这种由生抽、老抽、番茄酱、豉汁、胡椒粉、辣椒酱制成的“饮料”,除了三嫂,“没有人调得出那么正宗的味道”。

大学堂的传统节目“拜齐天大圣”,也仍是由她来负责准备香火。

这位从没摸过教材的老人,压根儿不曾想到,自己会成为大学堂“迎新教材”的一部分。在名为“宿舍历史”的课程中,每年新生都要学习宿舍之歌:“大学堂有三宝,旋转铜梯、四不像雕塑和三嫂。”

更特别的荣誉出现在2009年6月。一天,三嫂突然收到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寄给她的信,邀请

其“接纳香港大学之名誉学院院士衔”。她事前毫不知情,此前,旧生会多次向学校提议给她颁发荣誉院士衔。直至2009年1月,周兆平副校长亲自作出提名。而在之前,只有“社会名流”才有可能进入这份提名名单。

“我相信三嫂是没有争议的。”这位提名者说。事实证明,三嫂的提名“全票通过”。

3个月后,“不知道院士是什么”的袁苏妹前去参加典礼,坐在面对600多人的台上,她一直试图记住前面的人“走哪条路、何时戴帽、怎样行礼”,生怕“忘记了整个程序”。

她坦承,直到走上台前,“袍子里面的腿一直在抖”。直到听到周伟立提到她曾经因为逃难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时,她感到一阵“辛酸”,最后“糊里糊涂地”接受了副校长的颁奖。

当时,观众中20多名“头发都白了”的旧生,兴奋地跳起来鼓掌喝彩,典礼负责人甚至不得不让工作人员走过去,请这些政商两界的知名校友“不要太激动,保持安静”。

次日,旧生们振臂簇拥中的三嫂被《苹果日报》头版以整版报道。此后,她登上了美食节目介绍自己拿手甜品“马豆糕”的做法,在娱乐节目“东张西望”中被专访,香港各大报纸几乎都能找到三嫂的照片。

然而,这个爱看韩剧的老太太并没有被这些突如其来的荣誉打乱阵脚,尽管有时在街上,她偶尔会被陌生人惊喜地叫住:“你是三嫂吗?恭喜你。”

“我的生活没什么变化。”三嫂一如往常淡淡地说。

据《中国青年报》